

【区域协调发展】

黄河流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研究*

李曦辉 张杰 邓童谣

摘要: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历史长河中曾作为经济中心大放异彩。然而当前黄河流域内各省区整体生产力水平偏低,发展协调性差,集中了较多贫困人口。着眼全国发展大局,黄河流域各省区亟待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搭乘“一带一路”倡议的便车,加强产业协作与互补,调整各自产业结构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进而提高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水平,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黄河流域;“一带一路”建设;规模范围;分工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6-0030-08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实版全球化理论悖论与‘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18BJL086)。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081)。

张杰,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邓童谣,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1)。

黄河流域面积752443平方千米,从西到东横跨四个地貌单元,包括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和山东省九个省区。建设黄河流域经济带符合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民的现实需求。这个过程中首先要确定黄河流域当前的发展水平,再因时、因地施策,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带给黄河流域经济带的机遇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带式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代表着由过往的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建立黄河流域经济带,是对于“四大板块+四大战略”的有益补充,重组沿黄产业链,以产业链条的合理延长和分工为契机,适应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坚强

助益。

1. 借助国内经济格局重组形成沿黄产业链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战略、“七五”时期的东部率先战略、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东部崛起战略发展至今,国家战略不断调整与修正的过程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不平衡和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①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沿黄各省区的资源禀赋各异,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效的需求与供给,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很强,具有很大的分工潜力与合作空间,这为经济带的建设奠定了根本。“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交通效率不断提高,黄河流域公路、铁路、航路、水路以及管路的铺开带来全域的交通互联,水陆空三位一体的运输体系为经济带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信息技术的不断改善,5G和云服务等高新技术应用广泛,黄河流域数字化平台的建设有效促进了信息的流动与共享,为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不同的民族国家,需要跨越民族之间的藩篱。黄河流域属于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大多居住在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上游地区,人口约占黄河流域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巩固多民族团结统一,而且有助于积攒跨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有益经验,探索如何进一步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融合,实现涵盖范围更加广阔、受益程度更加深远的经济全球化。

2.以沿黄经济带牵引区域经济格局的重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轨迹主要体现在省内的循环,由此带来以单个省、市为单元的相对割裂的板块效应。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不断提高资源的配置能效,实现尽可能高的产出投入比。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探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带动了更高水平的资源配置和更大范围的经济运行,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活动逐渐跃出了行政区划的范围,表现为更加明显的流域效应。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是对于流域效应的实践和深化,充分吸收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经验,着眼于黄河流域的整体布局,因地制宜、因地制宜,调整各地区的产业链条与产业结构,以企业为纽带加强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牵引区域经济格局的重组,凸显区域的综合比较优势,逐步从非均衡发展过渡到均衡发展再过渡到高水平均衡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发展的眼光总是投向国内,行政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生产什么还是生产多少的问题多由政府主导。改革开放这种实践的进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时期,我们逐渐将眼光投向全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过程要求从传统的一维直线型、二维平面型、三维普通空间型的增长模式,过渡到“建立以点线面角综合支撑多极点多轴线多层面多视角的互融性、复合性、特色性、立体性多维度配置生产力新形态。”^②

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切实贴合新型生产力配置的要求,以周围若干中小城市和城镇为依托,全面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和辐射效力。中心城市承担着行政中心、金融集群和交通枢纽的功能,产业结构的升级伴随着传统产业以及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向周边不发达地区的转移,不断加强双方产业协作与产业互补,加快产业一体化与市场一体化的进程。

而且,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早在4000年前就有黄帝和炎帝部落联盟在此劳作和繁衍。一直到北汉时期,黄河流域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成就了农业文明的鼎盛。从南北宋时期一直到近代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迁移,但这里依旧在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和崛起,沿黄省区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拓宽市场边界,突出经济集聚效应,形成相互牵引的产业链条,带动区域经济格局的重组,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定将唤醒黄河流域曾经的经济活力。

3.“一带一路”倡议为沿黄经济带的崛起带来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中国版本,要克服包括民族宗教因素在内的非经济因素障碍以及以往的模式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断挖掘区域之间合作新模式。沿黄经济带搭乘“一带一路”的便车,借助自身优势,要更坚定地走上这条互尊互信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借鉴之路。

第一,黄河流域资源充沛。作为农产品主产区,黄河流域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在全国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在矿产资源方面,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基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有色金属的资源储备丰硕,煤炭的储量更是达到全国的二分之一以上。第二,黄河流域交通便利。四川可以借助四川自贸试验区与天府新区,甘肃可以借助“兰州—加德满都”南亚公路联运体系,陕西可以借助

西安港的建设、中欧班列线路的开拓和“长安号”的诞生,河南可以借助郑州航空港、无人港以及郑欧班列的开通,山东可以借助著名的十大港口等,再加之各省区之间不断打通梗阻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黄河流域经济带形成了内部紧密、外部通达的交通网络。第三,黄河流域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河南和山东两个人口大省使得整个沿黄经济带在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具有劳动力数量优势,在发展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方面具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随着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持续投入,这些劳动力还具有为优化产业结构以及调整产业链条提供后发动力的素质提升优势。第四,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在我国的三大经济地带和点、面之间,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有‘梯度差’就蕴含着‘经济势能’。”^③这种发展水平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落差。沿黄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不同的层次水平,而且各级产业提供的就业与创造的产值不相匹配,这种发展阶段的相对差异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相对发达的地区将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转移方可节省时间与资源进行更高层次的产业积累,吸收方可以提高原本的产业结构水平,从而加速大范围区域布局的升级与合理化。

黄河流域在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大放异彩,独有的自然风景与厚重的人文历史都在凸显着滋养华夏五千年的黄河文明,经济的繁荣更是在沿线人民的血脉里留下了独特印记。自古黄河流域就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黄河流域经济带自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子系统。“一带一路”倡议则刚好为沿黄经济带的崛起带来了新的契机,牢牢抓住资源、交通、劳动力的优势,充分利用产业结构的落差,重新实现历史的繁盛。

4. 黄河流域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入水平

当前沿黄各省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以及发展禀赋的区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水平层次不一,差距颇大(见图1)。

2019年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实现贸易额14.4亿元与73.39亿元,青海省同比增长13.9%,宁夏回族自治区同比下降11.4%。两省区尽管地处偏远,经济带上位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末位,但随着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后发力量强劲。甘肃省、山西省和陕西省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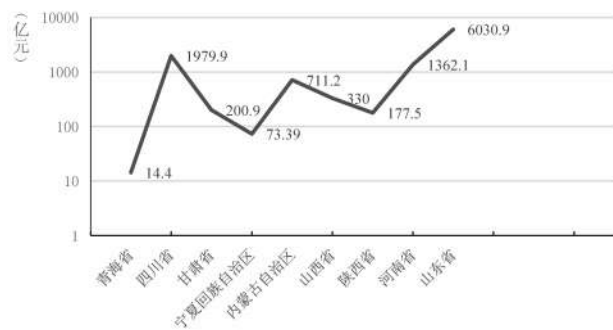


图1 2019年沿黄各省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分别为200.9亿元、330亿元与177.5亿元,占当地进出口总量的比率分别为52.9%,22.8%与54.6%,属于黄河流域经济带上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等水平,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和四川省2019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711.20亿元、1362.1亿元和1979.9亿元。其中四川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占全省外贸总额的29.3%,进步显著。蒙、豫、川三省与甘、晋、陕三省相比数量级获得进一步提升,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山东省2019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外贸进出口6030.9亿元,超过沿黄经济带其余八省区的总和,与去年相比增长15.9%,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29.5%。其中,出口总额为2824.0亿元,同比增长5.7%;进口总额为2373.6亿元,同比增长9.4%。总体而言,山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范围最广,程度最深,表现最为优异。

尽管当前黄河流域各省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彼此之间差距明显,但是脱离区域位置、自然禀赋及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差异谈论绝对数值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发展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要着力推动黄河流域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更高水平的经济建设,使得开放的红利释放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二、新冠疫情给黄河流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

2020年注定是跌宕起伏的一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

机,逆全球化的声音逐渐凸显。一方面为了增强不同国家自身面对公共卫生挑战时独立应对的能力,第一步就是打破业已存在的相关医疗卫生用品的世界产业链,将工厂召回本国;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忌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以及经济实力,而中国强大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因此将捍卫霸权利益具化为抵御全球化进程。**

但是全球化的进程从来不会以单个组织或者单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它已经是现实的不可逆转的存在,逆全球化将导致大规模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浪费。在疫情防控方面,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任何国家如果表现为一座“孤岛”都难以独善其身,整个人类作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尽快赢得抗疫胜利。同时,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加快经济的复苏同样需要全球性的经济合作。“黑天鹅”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底层逻辑,该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全球化具有规模与范围效益,前者是在一定的要素组合后首先实现规模,其次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最后表现出经济性;后者是这些要素组合带来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之后呈现出经济性。由此看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无论对于规模还是范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打造的国际化交易平台上,生产要素以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大的自由度进行更充分地流通,沿线国家身处不同的地理位置,经历各异的发展阶段,这些差异也代表着需求的创造以及更多要素组合的可能,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规模与范围效益。

第二方面是全球化能够强化分工,带来经济效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⑧参与“一带一路”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禀赋,由此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多种多样的需求,引致交换和贸易的倾向,继而推动分工的持续与供给。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这种分工协作带来的节约效应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关系的拓展更加突出。

当前,“去中国化”的声音也不时响起。作为一

种政治炒作,其实际意义也同样经不起推敲。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不断积累建设起完备的工业体系,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加之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诸多比较优势联合所形成的局面。无论是选择中国制造,还是加入中国市场,表面上是跨国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资本的逐利性。常态化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正有序推进,中国的产业链也在加快恢复。

在后疫情时代,全世界都不可避免地进入新的全球化阶段,全球治理也将迎来不同规模的调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全方位的社会‘体检’,以极端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检测中国制度环境的健康状况。”^⑨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⑩风险的扩散总是伴随着机遇的诞生,我们应当相信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基建”的不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用,黄河流域经济带更应当抓住机遇,搭乘“一带一路”的便车,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条,扩大对外开放,助力实现脱贫攻坚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三、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发展现实

黄河连起辽阔的中原腹地,沿线九省区面积广阔、资源丰富,具备良好的合作发展条件。但与发展迅速的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对比,沿黄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偏低,经济综合实力较弱。

1. 黄河流域经济带的 GDP 水平

截至2019年底,沿黄九个省区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在全国占比24.97%,其中山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表现抢眼,生产总值均跻身全国前六,有力地拉动了黄河流域经济带整体发展水平,但是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仍相形见绌。比如广东省全年生产总值为107671.07亿元,占全国比重为10.87%,已经超过九省区总和的三分之一。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全国平均水平在70892元,九省区均低于平均线(见表1)。

综合来看,黄河流域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各地区间发展水平不一。尽管山东、河南和四

表1 2019年黄河流域经济带地区生产力水平指数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生产总值全国占比 (%)	比去年同期增速 (%)	年末城市常住人口 (万人)	人均生产总值 (元)
青海	2965.95	0.30	6.3	609	48981
四川	46615.8	4.70	7.5	8375	55774
甘肃	8718.3	0.88	6.2	2647	32995
宁夏	3748.48	0.38	6.5	695	54217
内蒙古	17212.5	1.74	5.2	2540	67852
陕西	25793.17	2.60	6.0	3876	66649
山西	17026.68	1.72	6.2	3729	45724
河南	54259.2	5.48	7	9640	56388
山东	71067.5	7.17	5.5	10070	7065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川三省整体发展向好,但并未对其上游其他省区产生显著的联动效果。当前各省区之间相互割裂,尚未形成前后联系、相得益彰的产业链态势,黄河流域经济带整体也尚未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局面。

2.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对外经济贸易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中国整体对外经济贸易不断向深层次的宽度和广度拓展。黄河流域经济带各省区的对外经贸水平全年稳中有进,在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对外投资活动也表现得更加活跃(见表2)。

截至2018年底,货物贸易方面,黄河流域经济带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占比12.24%,山东省遥遥领先,四川省、河南省属于中等偏上水平,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排名靠后。对外投资方面,山东省依然表现优异,河南省和四川省次之,青海省最差。沿黄九省区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之和为16.14%,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比之

和为10.98%,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提升,这代表着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贸易水平不断加强。流域外部仍旧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对比,该省2018年全年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23.46%,对外投资占比16.43%,外资企业投资总额占比24.74%,均在一定程度超过九省区指标总和,这说明黄河流域经济带对外经贸仍然整体规模较小,能力较弱,对外投资力度不足。

究其原因,黄河流域除了生态环境脆弱等天然因素,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弊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对外经济贸易的繁荣。经济发展讲究聚集效应,但是沿黄各省区联动基础薄弱,内生动力不足,没有形成以黄河为轴互相牵引的流域产业链,一直保持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和分割式的发展方式直接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3.黄河流域经济带各省区的产业结构水平

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是后发国家不断加快经

表2 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对外经济贸易水平指数

地区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全国占比 (%)	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流量 (亿美元)	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流量 全国占比(%)	外资企业投资总额 全国占比 (%)
青海	7.3	0.02	2.29	0.02	0.10
四川	899.2	1.95	217.74	2.22	1.62
甘肃	60.1	0.13	59.08	0.60	0.30
宁夏	37.8	0.08	44.87	0.46	0.24
内蒙古	156.9	0.34	88.31	0.90	0.58
陕西	533	1.15	65.71	0.67	1.53
山西	207.6	0.45	52.24	0.53	0.81
河南	828.1	1.79	385.76	3.93	1.36
山东	2924	6.33	669.06	6.81	4.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及中国商务年鉴。

经济增长步伐的核心要求。由于黄河流域工业化发展水平普遍低下,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因此三大产

业的比重高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各个省区当前发展的现状(见表3)。

表3 黄河流域经济带各省区的产业结构水平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生产 总值地区占比 (%)	第二产业生产 总值地区占比 (%)	第三产业生产 总值地区占比 (%)	第一产业就业 人数地区占比 (%)	第二产业就业 人数地区占比 (%)	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地区占比 (%)
青海	2865.23	9.36	43.52	47.12	33.45	21.06	45.49
四川	40678.1	10.88	37.67	51.45	35.90	27.20	36.90
甘肃	8246.07	11.17	33.89	54.94	53.90	15.50	30.59
宁夏	3705.18	7.55	44.54	47.91	40.84	18.04	41.13
内蒙古	17289.22	10.14	39.37	50.48	42.79	16.81	40.40
陕西	24438.32	7.49	49.75	42.76	38.05	15.93	37.95
山西	16818.11	4.40	42.15	53.44	33.71	23.16	43.18
河南	48055.86	8.93	45.85	45.22	35.36	30.60	34.04
山东	76469.67	6.47	43.99	49.53	27.80	35.30	36.9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注:宁夏就业数据来自2017年)。

截至2018年底,黄河流域经济带绝大多数省区的产业结构已实现了从“二二一”到“三二一”的转变,产业结构与布局逐渐趋于合理。除山西省和山东省外,其余七个省区第一产业经济贡献占比均高于7.2%的全国平均水平;仅四川省、甘肃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产业经济贡献占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7%;而在第三产业经济贡献方面只有甘肃省、山西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2.16%。其中陕西省与河南省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占比均低于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容纳的就业人数也低于第一产业。

综合来看,各省区之间产业结构不在同一水平,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落差过大,劳动力转移就业尚未完成,主要就业人员仍集中于第一、二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滞后,产业结构亟待优化。由于黄河流域经济带各省区产业基础差异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未来要不断缩小产业结构落差,逐步进行产业转移,以黄河为脉络形成紧密的产业链条。

四、黄河流域加快加深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

着眼全国发展大局,黄河流域各省区未来的发展要更加深入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沿黄增长极,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搭乘“一带一路”的便车,进而提高对外

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水平。

1.以全球化的眼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沿黄极增长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国外,但是建设的基础始终在国内。开放的实质是在于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不仅要继续坚持中国立场,发掘中国潜力,而且要拥抱世界格局,打开全球视野。“带”和“路”的精准对接,将形成对外开放以及对内搞活两者之间积极有序的正向循环。

第一要创新发展,目的就在于寻找到发展的动力。金碚曾提出“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④沿黄极增长要注重以资源开采技术以及资源利用工艺为代表的实践创新。不断壮大绿色导向、智能导向的新兴产业,把传统产业引领到节能环保可持续的路径之中。

第二要协调发展,目的就在于解决不平衡的问题。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协调带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协调,通过运输网络体系的构建形成有机衔接,经济比较发达的下游反哺经济欠发达或者不发达的上游,对整体的关系与效能给予更大的关注。

第三要绿色发展,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经济园区的建设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尤其是以优势特色资源深加工为核心的绿色产业,还要不断发掘化工类产业园区的生存发展路径,持续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方向转变。

第四要开放发展,目的在于达成内外的联动。黄河三角洲作为历史上中国与世界握手的重要窗口,在今天仍旧保持着开放的本色。要着力构建多维度的政府间宏观政策的沟通以及交流机制,积极参与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中。

第五要共享发展,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黄河上游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在贫困人口脱贫以及贫困县摘帽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恩格斯提出过“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着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⑤。因此更要继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沿黄增长极。

2.以流域为引带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习近平主席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到,“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⑥沿黄省份要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不同定位与角色,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流域为引带实现上下联动、东西联动。

根据刘东升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可以有效促进对于稀有自然资源的节约,倒逼集约高效的开发利用,改变当前资源性重化工的特征,把高污染、高消耗产业以及低端制造业等进行转移。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上升^⑦。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引导沿黄省份的发展重心向以知识密集以及资本密集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不断提高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和转化效率,形成一批不仅拥有核心技术,而且能够打造独立品牌的龙头企业。

黄河流域长期存在的一个短板就是高层次人才的匮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黄西部省份人才的流入量不足人才流出量的1/2。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开放与发展,优化的生态环境与就业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人

才队伍的稳定。要不断改善传统的评估、勉励的机制,完善海内外精英的引进方式,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创新创造能力强的后备人才队伍,打破过往“封闭—落后—更封闭—更落后”的怪圈。

3.在全球化视野下形成流域的竞争优势

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打造全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格局的总抓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着力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断提升和牵引开放决策力与开放统筹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致力于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典型的国际商贸合作与双向投资的大平台;长江经济带建设旨在打通中国境内的大进大出的国际通道,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区域为改革开放的布局提供重要支撑,那么黄河经济带建设的目标就是形成东中西协同一体的协调发展带以及生态经济相平衡的绿色支撑带,不断缩小中西部发展差距,塑造经济发展新态势。

在生态保护方面,首先要意识到“黄河的水来自上游,泥沙来自中游,灾害主要发生在下游。”^⑧那么上游的主要任务是水源涵养生态功能的维系和稳定。中游要着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不断减少水土流失,重点监督污染物的排放问题,继续推动水利工程的加固。下游工作重点在于污染治理、滩区治理、洪涝旱碱治理以及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等。三管齐下,协同开展修复与重建工作。

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游的青海、甘肃与宁夏资源丰富,城镇化水平低,发展的载体在于以点状开发的形式建造的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不仅包括传统资源,而且要涵盖锂电等新材料以及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还要不断推进农牧业、畜牧业的规模生产与品牌打造,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体系。四川省要继续推动以饮料食品、油气化工等为代表的七大传统优势产业与以页岩气、节能环保装备等为代表的五大成长型产业发展,着力促进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中游的内蒙古、陕西与山西要促进基础能源与建筑材料、装备制造等过往优势产业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产业链向航空航天装备、轨道交通设施等高端制造转移。以呼和浩特、西安、太原等省会城市为示范,尽快培育生物医药、三网融合等连接替代型的新兴产业。

下游的河南和山东持续推动农业向节水化、机

械化以及现代化转型是十分重要的发展课题。与之并重的是以郑州、洛阳、济南、青岛等中心城市为依托发展制造业,促进以食品、家电、纺织等为代表的基础产业集群的壮大,以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精尖医疗器械等为代表的高端产业集群的成长,使其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角逐实力的制造业王牌军。

此外,随着自然资源的逐渐枯竭,将给予第一、第二产业日渐增多的禁锢,整个黄河流域都应当对现代服务业给予充分的重视。不仅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且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经济越发达,居民越富裕,第三产业的战略地位就越高^⑨。打造文化旅游业的名片,也将成为流域的竞争优势之一。

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的贯通,也是文化的融汇。“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是指其自然物质以上的供养和支撑,而且是指其在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沉淀和进化。”^⑩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中孕育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助于营造出宽松自在的文化交融环境,形成文化上的竞争优势,助力黄河流域融入“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注释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57页。②郭先登:《新时代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下多维度配置生产力研究》,《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③陈栋生:《走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布局对策》,《工业技术经济》1987年第2期。④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⑥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⑦刘东升,张志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结构与作用分析——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为例》,《工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3期。⑧许学工:《构建黄河流域生态文化经济融合发展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第6期。⑨李江帆:《中国第三产业的战略地位与发展方向》,《外贸经济》2004年第1期。⑩陈晓东,金碚:《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改革》2019年第11期。⑪(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第8、16、69、87、91页。⑫金碚:《论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思考》,《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2期。⑬习近平: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2020-4-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3404313790504001&wfr=spider&for=pc>。

Research o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tegrating in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 Xihui Zhang Jie Deng Tongyao

Abstract: As the mother riv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Yellow River used to shine brilliantly as an economic center in the long history. However, the overall productivity level of the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the basin is low, the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is poor, and more poverty-stricken population are concentrated here at present. Focu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rovinces and region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urgent needed to break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market barriers, 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the trans regional elements, jo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engthen th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each region to form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nation rejuvenation.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cale and Scope; Labor Division

(责任编辑:文 锐)